

●程永新推荐

望尽天涯路

关于巴金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李辉 / 文

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 或者一个咖啡馆 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 1998 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 1928 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 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 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 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 俯瞰四周。河南岸 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 小巷弯弯曲曲 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 仿佛时

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怀。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我沿着拉丁区及相邻的卢森堡区的大街小巷漫步，我不时在河边的旧书摊前徜徉。一幢又一幢老房子，仍是百年前的模样，但我不知道哪一幢才是巴金当年寄寓的旅店。有些遗憾却不失望。每到一处，只要过去曾在巴金作品中读到过，或者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某种关联，我便不由自主地来想像当年这位二十三、四岁的中国青年徘徊的身影。卢森堡公园的树丛草地，他在这里穿行，或者久久坐在里面看书；先贤祠前卢梭的雕像，他曾伫立在此，缅怀心目中那位写下《忏悔录》的伟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押过罗伯斯庇尔、丹东、哥代（又译哥黛）小姐等风云人物的监狱里，我想到了巴金在小说中如何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走进王尔德流亡巴黎最后寄寓而病逝的旅馆，我想到巴金曾翻译过《快乐王子集》，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

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一家名叫“罗马”的咖啡馆，因流亡到巴黎的列宁曾光临过，并和托洛斯基相约在此见面，也让我想到了巴金在还没有来到巴黎之前，曾就俄罗斯革命和列宁等问题而与郭沫若发生的争论……

逗留巴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我便以类似的感觉，走在巴金当年居住过的拉丁区及周边地区。

巴金抵达巴黎是在 1927 年 2 月 19 日，离开这里回国是在 1928 年底。在巴金的百年行程中，巴黎实在是最具转折意味的地方，是最值得解读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的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二十世纪走进二十一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

看那少年浪漫时

到巴黎去，并非巴金心血来潮的决定。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国求学，而是他的思想之路的必然。

从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阅读新报刊，并很快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起，巴金仿佛就注定要走出来，要超越国界，成为世界

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分子——虽然这个革命渐渐被人淡忘，因时代变迁而越来越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但对于他，那却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环节。

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成了所有流亡者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大革命的传统和自由、平等的理想，使这个国度敞开胸怀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流亡的列宁、托洛斯基来到过，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联，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来到过。巴金自己便说过，他在巴黎时就曾和不少来自苏联、波兰等国的流亡者见过面。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法国也成了中国许多渴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前往的首选地。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是在法国及周边国家勤工俭学大军中的一员。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进而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巴金的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同志，也在他之前来到巴黎。

现在，巴金也来了，在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寻求新思想的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之中，又多了一位将在历史上大笔书写的青年。

1927年1月15日，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船离开上海。此时，他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决不是那种只是渴望远涉重洋去留学的莘莘学子，更不是仅仅满怀闲情逸致而好奇地去漫游世界的富家子弟。二十三岁，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少年轻人告别大学走上社会的年龄。可是当年的巴金却不。从十五六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到二十三岁过后前往巴黎，他已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办过多种政治刊物，写过许多诗文，翻译过不少著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俨然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将了。

关于少年时代如何接受到“五四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有过许多回忆。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他所渲染的早年的浪漫和陶醉，常常让我对他所经历的历史场景充满想像。

从巴金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被克鲁泡特金点燃热情的少年巴金，

曾和朋友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夜未央》剧本，他们甚至排演过。与此同时，他还读到了俄罗斯女革命家、流亡西欧的高德曼的文章。巴金这样回忆过：“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个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这是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从俄国历史与文学中汲取力量。巴金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最初接触《告少年》和《夜未央》那时起，反映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运动、民意党人反对沙皇斗争事迹的传记和创作，都曾深深吸引了他。

巴金的精神之旅，从十五岁那年起，就以与世界性的思潮和外国革命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方式开始了。这是巴金独有的道路。我们看到，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不同的是，少年的这一次亲密接触，竟会持久不变地影响巴金，进而塑造巴金。可以说，少年时的青春萌发，为他瞭望世界的窗户一旦打开，方向就不再改变。他的历史见识，他的精神成分的构成，乃至因此而酝酿的文学气质，从他站到这扇窗户面前那时起，就按照一条清晰可见的直线发展了。

真没有想到，少年的陶醉、少年的梦在巴金生命中竟会延续得那么长久。陈丹晨先生在描述巴金一生时，以“巴金的梦”作为传记的书名，的确非常贴切而具概括力。

当谈及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我倾向于相信，一次“偶然”所起的作用，常常会大于所谓的“必然”。对一个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他对信仰的确定，他对某一事业的投入，有时恰恰会因一个生命细节而决定。在回望少年巴金的道路时，“写信”这一日常生活的举动，因某种偶然而具有了至为关键的意义。

巴金不善言辞，他更喜欢在信中与人交流。在去巴黎之前，巴金

有过三次重要的通信 在他的一生中 具有特殊意义 值得细细解读。

1920年，十六岁的巴金在故乡成都家里写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封信 收信人不是别人 而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陈独秀。

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写毕生中第一封信的。在阅读了《告少年》之后 他渴望有人帮助 渴望被燃烧起来的热情，会在他人引导下挥发出来。他按照《告少年》书中提到的上海新青年社的地址给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回忆说：“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就像一个谦卑的孩子 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 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这是少年巴金与四川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联系。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并决定寄出时 就清楚地表明 从思想上讲 他希望有人指引；从性情上讲，他有一种闯天下的冲动。

陈独秀没有回信。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 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他已经顾不上一一答复众多来信了，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

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的编辑。他阅读了 1921年2月《半月》杂志刊登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 与《告少年》昭示的未来相吻合。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

这封信刚寄出 第二天《半月》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 欢迎他参加适社。他的到来，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在思想尚未明晰、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感到荣幸，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

《半月》编辑来访，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这一接触 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 开始拥抱社会 拥抱世界。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譬如，如果陈独秀回了信，巴金是否会是一种发展 又譬如 如果《半月》编辑也没有答复 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

热情 然后 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 如他的许多同辈一样 平淡地走下去？

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一封信可以决定的。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设想，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就能深深感动他，进而服膺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

对一个少年来说，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封信，一次谈话，甚至一束目光，就能产生影响，并最终予以改变。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而《半月》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切，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感情的回报与共鸣，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

几年之后，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时间 1925 年年初，地点 南京。此时，巴金已过二十岁，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这封信的行程很远，目的地是加拿大；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俄罗斯流亡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女士。

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在此之前，就日本政府在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才可以看做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并可将之看做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

与高德曼女士通信无疑令青年巴金激动。高德曼——早就熟悉的名字，他甚至将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说高德曼是

“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就是至高的赞誉。

现在，在经历了数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过程之后，巴金给遥远的“精神上的母亲”写信了。向她倾诉心中的感激、景仰，向她描述一个中国青年献身理想的热情和决心。这封信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希望它还躺在世界上某个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有一天某个研究者会意外发现。

让巴金感到激动的是，他在南京很快就收到了高德曼女士的亲笔回信。从此，他开始了与“精神上的母亲”长期的通信。十年后的1935年，在撰写回忆文章《信仰与活动》时，巴金用赞美的笔调描述了高德曼，并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摘译了片段。从这些摘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曼对远在东方的这位年轻人充满着热情和关爱。

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回信时，巴金已经选择了信仰，不再存在受此影响而决定未来道路的问题。更大程度上，这是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直接交流，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强化感情上的沟通，让青年巴金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从决定信仰那天起，巴金心中所系、所想就是人类的大同。实际生活中，他所走的路也是在试图一步步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从这一方面说，这次通信将巴金与国际联系得更紧密了。

两年后，巴金来到了巴黎。

巴金继续与高德曼通信，从她那里不断得到教诲和帮助。他还特地到巴黎郊区拜访了高德曼的丈夫、同是革命家的柏格曼。后来，对柏格曼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巴金非常喜爱，曾翻译柏格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并参照柏格曼的著述撰写了关于俄罗斯民主革命历史的著作。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在巴黎渐渐向巴金走来的，是巴托罗米欧·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费迪南多·萨珂（Ferdinando Sacco）的死。两个远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死刑执行，以及围绕这一事件而掀起的全球性浪潮，根

本改变了巴金的生活方式和道路。

巴金所说的“鱼贩子”是凡宰特，“鞋匠”是萨珂。

凡宰特和萨珂都是住在美国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劳工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在美国被捕，凡、萨两人发起救援活动。5月3日萨尔塞多被处决后，抗议活动更为激烈，凡、萨二人也上了波士顿当局的“黑名单”。正在此时，马萨诸塞州一家鞋厂发生了杀害保安和会计的案件，警方遂将罪名强加在凡、萨二人身上，5月5日将他们逮捕入狱。由于案件明显存在漏洞，抗辩与申诉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七年之久。后来，真正的凶手落网，事实证明与凡、萨无关。尽管如此，1927年4月9日，马萨诸塞州法院仍将他们两人和凶手一起判处死刑，并将在同年7月10日执行。

不公正的判决一经公布，随即引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抗议。

身在巴黎的巴金，就在此时读到了凡宰特的自传。同一种信仰，同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本来就处在苦闷和忧郁之中的。有着敏感情绪的巴金，此刻为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凡宰特——这位被关押多年的“鱼贩子”的命运而忧虑。年轻的巴金也成了全世界声援活动的一员，他在巴黎的生活也因为参加这一声援活动而发生变化。

此时，他想到了伦敦的高德曼——他的“精神上的母亲”。他写信前去倾诉心中的痛苦。

除了高德曼的鼓励，巴金因身在巴黎，在这座城市过去发生过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冤屈者辩护的范例，对他显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譬如伏尔泰，譬如左拉。巴金自己后来说过，他对伏尔泰所知不多，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

给凡宰特写信对巴金来说，是一件异常神圣的事。拿起笔的瞬间，激动实不亚于当年在南京给高德曼写信：“我于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

的房子里 用大张的信笺将我的胸怀 我的悲哀 我的挣扎 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 写给那一个德含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凡宰特回信了 这无疑是巴金在巴黎遇到的最大惊奇和激动。读完凡宰特的信 巴金立即回信 他还随信附寄上自己的照片。随后 他拿出笔记本 写下此时的感受。这些日记 后来便成了《灭亡》中第十一章的片段。这一章叫做 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在巴黎，最初产生冲动用日记形式来写下文学片段，是在 1927 年 4 月。当时，传来了国内“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尽管在信仰与政治态度上巴金与共产党不同，但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表现出极大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杂谈《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

以这样一种方式，李大钊与那些巴金赞美过的法国、俄罗斯的英雄们一样，在他心中供奉的祭坛上有了光荣的位置。而现在，让巴金担忧的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凡宰特、萨珂，很可能又将走上“殉道”之路。

与初到巴黎时的那种寂寞、苦闷相比，凡宰特事件的出现使巴金的巴黎生活开始有了天天关往的具体内容。8 月 22 日，凡宰特和萨珂被送上了电椅。

现实的悲剧又一次给予巴金沉重打击。

此时的巴金已从巴黎搬到距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巴黎《每日新闻》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巴金为之愤怒。他说他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写信，向各地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悲哀。他又拿出了笔记本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从巴黎开始断断续续写出来的片段，后来串联起来，成了巴金的

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凡宰特、萨珂两人的生死起落。虽然作品的背景是中国，反映的也是巴金在国内经历过的或者感受过的现实，但他的心理背景却是世界性的，是与凡宰特他们密切相联系的。

巴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在巴黎走上了中国的文坛和历史舞台。

在《灭亡》作品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巴金因受到凡宰特悲剧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悲愤与不安。他是借杜大心这个艺术形象在发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有话要说，有热情要燃烧。

这正是巴金走向文学的首要推动力。

到巴黎来，巴金开始了走进世界的行程；继而，声援凡宰特，萨珂，他又直接融入了世界。现在，令世界关切的悲剧，促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诞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中国作家将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走向世界。

五十五年后，法国把特殊的荣耀给予了巴金。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紧紧握着巴金的手，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佩戴在巴金胸前。在致辞中，密特朗总统说：“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对于巴金，来自法国的赞誉无疑是他晚年收到的最好礼物。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与高德曼、凡宰特通信的李·蒂甘，选定了一个笔名——巴金。特殊的笔名，不能不让人总是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两位大师巴格宁、克鲁泡特金。

关于这个笔名，巴金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

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哲学家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见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

巴金历来矢口否认这个笔名是取巴格宁的首字“巴”、克鲁泡特金的尾字“金”组合而成。从走上文坛即日起，他就对人们如何看待这个笔名显得格格外敏感。每当有人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就把他的作品看做是表现“安那其主义”时，他便为之忿忿不平。

然而，联系到他早年的信仰，“巴金”又是多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尽管巴金否认，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笔名与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和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巴金关于“巴”的选定的回忆和解释，当然并非完全虚饰。他在沙多一吉里寄寓拉封丹中学并继续写作《灭亡》时，的确有一个同学姓巴，而且这个同学的名字，现在仍可在拉封丹保留下来的花名册上找到。我猜想，巴金可能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同学，才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的确有“巴”这个姓。这样，当他确定笔名以“巴”为姓时，就理直气壮了。而“金”，他**自己**承认与克鲁泡特金有关。我还想，李蒂甘在确定用“巴金”这个笔名时，难道没有想到人们非常自然的联想吗？但他没有犹豫。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一是以往他曾使用过不少笔名，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想到这个新笔名会很快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一直用下去；二是此时的他并不避讳类似的联想。至少愿意做这种理解。

即便按照巴金本人的解释，他的笔名至少与克鲁泡特金有关。

从十五岁第一次读到《告少年》那时起，克鲁泡特金就以其思想、人格、著述而深深吸引着巴金。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不仅重译了

《告少年》并易名为《告青年》，而且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理论专著《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等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别的人。另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克鲁泡特金全集》。在描述巴金一生时克鲁泡特金实在是不可缺少的篇章。在翻译出版克氏自传后巴金1939年曾这样说过：“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巴金早期的社会理想完全是从克鲁泡特金那儿来的。“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这是巴金所赞成的两大目标。

对巴金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不论他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是四十年代他运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赖治恩神甫展开关于人生哲学的论战，都体现了他的完整的道德观念。他的道德观基本上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主要内容也是包括人性的三个要素：互助、平等、自我牺牲精神。

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最高的道德认识，又是与互助思想、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鲁泡特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过剩的精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在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到个人的最大乐趣。这个思想，巴枯宁有过更为明了的论述，他说过：“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

巴金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也喜欢一再引用这些话，并加以发挥。他这样表述过他的道德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

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巴金正是依据这种道德观来理解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关于巴枯宁 他写道：“他出身贵族阶级 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 来鼓吹革命 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实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 他都完全唾弃不顾。”他赞扬克鲁泡特金为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 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 甘愿去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的精神 并称克鲁泡特金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

互助、平等、自我牺牲 是巴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要素。其中思想是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情操和道德观念，个人主义是容易毁灭的 而人类不会毁灭 群众不会死 只有将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之上，个人生命的意义也才得到永生。1927 年 巴金在法国开始翻译《伦理学》。他在译序中说：“克鲁泡特金是拿这部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乐 也不在利己的 或最大的欢喜 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这里，还应该补充提到巴金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刘师复的敬意。刘师复受克鲁泡特金理论的影响而组织“心社”他制定了严格的戒约，其中有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等等。这种严格修身的生活态度 对巴金这样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青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在封建社会里 封建官僚的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教育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的称赞 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 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必将劳其筋骨”的格言 都是教育青年人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孔子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 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的思想 也是完全相同的。巴金虽然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但封建家庭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他对道德修养的兴趣 他在成都参加社会团体 办

刊物时 就介绍过刘师复的心社戒约。

从克鲁泡特金等人那里，巴金感受到的正是人格的力量与道德的光芒 而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无意之中踏上文学之路 对于巴金来说 其实应该说也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克鲁泡特金说过：“用你的笔为革命服务 雄辩地、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绘出人民反抗压迫的英勇斗争，用光辉的革命热情来点燃青年的心。”美国研究巴金的专家奥尔格·郎（Olga Lang）女士曾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如巴金自己所称的是两回事。巴金不是为写作而写作 他写作的目的是鼓励读者投入革命 将这不合理、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平等正义和众人幸福的社会。”虽然实际情况也许并不像奥尔格女士说的这样简单和绝对，但当巴金偶然间将一个个片段串联成《灭亡》并走向文坛时，选择与克鲁泡特金有关的一个笔名 也就水到渠成了。尽管巴金不愿意公开承认 或者说在表述上有所顾忌 但历史就是这样在他身上发生。

“巴金”这个笔名 未来的人们还会不断地加以解说 不管巴金本人是否情愿，也不管是否符合他的解释。

历史在心中延续

几十年后 凡宰特、萨珂事件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1974年 根据美国法律 凡、萨审判档案公开；1977年 在两人被处决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之际，马萨诸塞州州长决定将 1977年 8月 23日定为“凡宰特和萨珂日”并为他们昭雪。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巴金正在经受“文革”的磨难与煎熬，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不可能知道。如果知道，他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当年，巴金不仅发疯似地四处写信控拆美国法律的不公正和非正义 他还在《平等》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后来，他将在巴黎书店买到的那本凡宰特的自传《我的生活的故事》翻译

过古稀的老人，而历史的大起大落，更是早已把他大大改变。

在巴黎亲历的凡宰特、萨珂声援与抗议事件，以及他们最终的悲剧，巴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然，因为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方式的表现。

五十年代发生的“法斯特事件”值得解读。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创作过《公民潘恩》、《斯巴达克斯》等重要作品。1953年，他发表了新作《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多年前的不公正审判的真相予以披露，对两位受难者的人格与精神予以赞美。中国翻译家冯亦代和杜维中翻译了此书，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翻译时，凡宰特译为凡塞蒂。

我就此书询问过冯亦代先生，为何事过二十多年后法斯特重提此事，而中国当时要出版。他告诉我，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冷战最紧张时期，1952年美国进行了对世界著名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的审判。法院不顾全世界的抗议，仍将他们判处死刑，简直就是萨珂、凡宰特悲剧的重现。正是这一原因，法斯特的这部作品出版后随即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备受欢迎。他还说，他过去读过巴金关于描述萨珂、凡宰特的文章，所以，在中译本出版后，他还特地送给了巴金一册（据前几年的消息，罗森堡夫妇因牵涉间谍案而被判刑，并非政治审判，因此，这与萨珂、凡宰特案件性质不同）。

然而，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被披露出来，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裂变。一向激进、左倾的法斯特，决定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2月1日法斯特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党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法斯特招致猛烈的声讨和谴责。

中国文学界对法斯特的批判在1958年年初开始。巴金应《文艺报》之约，写来批判文章《法斯特的悲剧》。正是这篇应命之作，巴金招来对自己的批判。

从 1955 年不得已批判胡风、批判路翎以来，巴金已经不止一次写这类表态性文章了。被迫表态并批判法斯特，对巴金显然是一种痛苦。巴金读过法斯特的《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而且他引用的法斯特的文字与冯亦代的译文略有差别，可见他参阅的可能是英文本。查巴金日记，1953 年 11 月 5 日写道：“晚看法斯特小说很受感动。”此时他在朝鲜战场，而 10 月 26 日，他刚刚收到弟弟李采臣从上海寄来的三包书。他所说的小说，应该是指《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的英文版。当年巴金经常订购国外书籍，法斯特的书估计是在他赴朝鲜之前定购的。

阅读《萨珂与凡宰特的受难》巴金再次激动。于是 在他和法斯特之间 萨珂与凡宰特是连接彼此情感的纽带。现在 在他内心中 又怎能把一个以赞美笔调描写他心中英雄的作家，简单地看做叛徒而讨伐呢？尽管随着环境的变化，他已不再像巴黎时期那样吟唱高歌，但对于曾直接影响过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凡宰特，他永远不会忘记。法斯特的作品把巴金心中的英雄用文学形式塑造出来，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引起世人对这个悲剧的关注，我相信巴金对此是会深深感激的。

法斯特描写了凡宰特走向电椅时的最后场面：“他们并没有预见到他走入行刑室时的那种雄狮般的英姿，以及他站在他们面前时的那一幅尊严的神情。”法斯特记叙了凡宰特最后的话：“我要对你们说的是 我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宗教上的罪过也许是有的，但是绝不是罪行……”

现在 在《法斯特的悲剧》文章中 借惋惜法斯特 巴金终于有机会又一次提到凡宰特和萨珂的名字，提到 1927 年他在巴黎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向他们表示敬意：

有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过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